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43

2007年7月12日

《美國的神權統治》 — 2007年平裝版序言¹

(美國) 凱文·菲利浦斯 吳研雷譯

譯者按語：2007年4月，我在太湖大學堂向南懷瑾老師報告《美國的神權統治》一書的主要內容，老人家聽後便催促我儘快翻譯成中文，希望有關方面能夠瞭解。該書是美國政治評論家凱文·菲利浦斯的新作，在2006年出版之後便登上了《紐約時報》書評非小說類暢銷書榜首。凱文·菲利浦斯曾經是尼克森執政時期共和黨的選舉分析家和政治評論家。他曾經正確地預計到了美國政治版圖中從美國南方崛起的共和黨多數派，也創造了一個政治上的專有名詞“陽光帶”來描述從美國南方的佛羅里達州到加利福尼亞州傾向於保守政治的農業、軍火業和宗教右派勢力。他對喬治·W·布

¹ Kevin Phillips : *American Theocracy* 。

什總統當選以來美國政治、經濟、宗教的發展和現實危機的分析，受到各個利益集團的重視。本譯文採自凱文·菲利浦斯《美國的神權統治》2007年平裝版的序言。作者在序言中較為系統和突出地描述了他對美國未來危機的看法。現加以翻譯，供參考。由於美國特有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的內容原因，極少數煩冗的統計資料譯者予以刪除，以方便讀者閱讀的流暢性。

2006年11月7日，美國選民將國會衆院和參院的控制權交給了作為反對黨的民主黨。多數人認為這是人民對小布什行政當局的否定。這些事件說明，美國人民總算是行動起來了以糾正全世界幾乎所有民衆對美國領導人及其政策的負面看法。

此前三天，幾家有影響的外國報紙——英國的《衛報》，加拿大多倫多的《星報》以及墨西哥的《改革者》發佈了一項聯合調查。該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絕大多數人把喬治·W·布什列為僅次於本·拉登的“對世界和平有害”的人物。其他重量級人物包括“罪惡軸心”北韓的金正日和伊朗總統內賈德。相當多數人相信，自從2001年以來，“美國的政策使世界變得更加不安全。”

此說並非玩笑，也不是空穴來風。類似的調查結果自從美國於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後就不斷出現。例如，本書中詳細敘述了位於華盛頓的Pew中心從2003到2005年做的民意調查。該調查顯示，世界上多數人相信，入侵伊拉克並不有助於反恐，而是削弱了反恐。大多數人表示，布什總統的連任反而改變了他們對美國的美好看法。甚至我們最親密的近鄰和盟國也認為似乎美國人民的正常思維出了問題。

從2006年11月7日之後，國內外輿論開始談論美國的復原，美國中期選舉的結果表達了一個希望，那就是這個國家在“9·11”之後所失去的平衡開始恢復，因為正是從那時候開始，華盛頓把危

機轉為一個全球性的魯莽征討，一個未經宣示的聖戰衝突。這場戰爭中的好人是基督徒，其針對的“罪惡對手”是伊拉克和穆斯林極端派。在宣教派（evangelicals）和原教旨派（fundamentalists）的眼中，伊拉克和穆斯林極端派已經取代了前蘇聯成為美國的主要敵人。現在，由於公眾的新的覺醒，總算是有點希望了。在 2006 年的選舉中，宗教右派和共和黨中的神權主義者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但這僅僅是一個開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寫這本書的主要前提是，早在“9·11 事件”之前的幾十年中，美國在全球的脆弱性已經通過三個特點顯露出來：激進的宗教，耗資鉅大且極不穩定地對石油的依賴，以及對舉債金融的狂熱崇拜（包括日益增大的公共和私人債務），而“9·11 事件”加深了上述的危機。美國在伊拉克的困境，以及以中東為中心的“反恐戰爭”是深深植根於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宗教哲學，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對於石油的追求和對中東的軍事控制慾望。

過去的一年，新的證據進一步證實和完善了我的上述論點。讓我們先從石油政策的失誤開始討論。石油其實是 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主要理由，國內加油站的油價飆昇也同樣證明了美國政策的失敗。有的經濟學家預計，美國在伊拉克的冒險行動最終要付出的代價大約在二萬億到三萬億美元，而且這個數字也可能是低估了。因為假如到 2010 年，美國每年付出的進口石油和維繫中東駐軍的代價是二千億到三千億美元，總的代價可能更高。美國在石油生產國的信譽喪失殆盡。到 2006 年末，曾經是美國附庸的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生產國組織中叫喊提昇油價最積極。此事就像是懸在美國的宗教遠征軍頭上的一個事實的稅賦威脅。資料證明，俄羅斯和 OPEC 正在繼續減少手中的美元儲備而轉為持有歐元，這些國家也很可能進一步將石油提價以歐元計算而不是以美元計算。

美國激進的宗教團體（不僅僅是伊斯蘭教）在 2006 年繼續暴

露在新的困境之中。根據選舉的最終結果分析，一系列新的問題，比如幹細胞研究，南達科達州極端的反對人工流產的全民投票，美國宣教派全國委員會的道德醜聞，以及共和黨在眾院的醜聞，導致了美國中期選舉的結果，同時也對美國共和黨的領導力是一次嚴重的打擊，但是這個打擊遠遠超出了政治鬥爭範疇。部分選民也意識到是宗教的動機將美國拖入伊拉克戰爭的事實。從文化的層面來觀察，公眾意見的變化代表了對傳教士們和原教旨主義者過分的虛偽最重要的駁斥。這種狀況是自 1920 年田納西州思科普思（Scopes）有關進化論的“猴子”訴訟和辛克來·路易斯小說《愛爾摩·甘特利》（一部有關批評傳教士的小說——譯者註）宗教極端派最重要的打擊。但是激進派造成的後果還遠遠沒有結束。美國自“9·11 事件”以後宗教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中東的政策是無法推倒重來的，而喬治·W·布什則突出體現了這種政策，因為他顯然相信他是在執行一項代表上帝旨意的行動。

本書的題目“神權統治”的內涵正是試圖剖析這樣一種國家領導力，即神權統治就一個國家來說代表了其統治者（1）被民衆認為是代表上帝發言；（2）他或他們在事實上自稱是執行那種至高力量的角色。本篇序言目的（請注意它的副題：喬治·W·布什~神權統治者），是為了深入研究自 2005 到 2006 年出現的新的層面的問題。書中的第二部分就是要深入和突出表達受這種領導人推動的強勢的神權政治。

至於美國的債務困境也由於美國人在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幻覺而加深。“9·11 事件”以來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的鉅大堆積，加上伊拉克戰爭的費用和軍事需求為主導的能源政策，已經形成了數萬億美金的需求錯位。與此同時，以舉債為動力的金融服務業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已經達到 21%，而製造業只佔 13%。請記住，在過去 25 年中金融業的膨脹發達是與信用和債務的爆炸

性增長同步發生的。本書第三部分就是專注根據最新的資料和內容來審視美國惡性發展的舉債文化。

本書把激進宗教、石油和債務捆綁起來分析的最終目的不僅僅局限於分析處在 21 世紀的美國經驗及其脆弱性。我們這個國家不是特殊的，不是自成一類的。歷史的經驗令人不寒而慄。上述的三個問題在世界上已經步入衰敗的經濟強國的歷史上，從羅馬帝國到 20 世紀初葉大英帝國的危機中，都有突出顯示。當我在各地談論這個題目的時候，聽眾對這些歷史的借鑒表達的濃厚興趣促使我在新版中將這個命題進一步深化，作為一種歷史的命題開卷明義地展開闡述。同時在本書各節中也將穿插進行對比。

一、本書的緣起

寫作本書的主要動力緣起於政治，而不是宗教。在本書的首版精裝本出版後，《紐約時報》書評欄在頭版進行了報導，主要是因為《美國神權統治》一書攻擊了統治華盛頓的共和黨聯盟，而這本書的作者恰巧是 40 年前寫作《共和黨多數派的崛起》(1969)的人。在《共和黨多數派的崛起》一書中，我詳細解釋和描繪了保守政治的聯盟和逐步興起的過程。1982 年，《華爾街日報》稱本人為“保守派選舉分析家的領軍人物，他發明了陽光帶的名詞，起用了新右派的概念，並且預見到了新共和黨多數派的崛起”。1993 年，《紐約時報書評》的一位評論員稱我的見解是“通過 25 年來的分析和預見，沒有人能夠如此卓越地正確分析政治變革的框架。”

我的分析方法部分是基於對歷史案例的分析，我對這個方法已經嘗試了多年。但是，本書的基本命題，即共和黨全國聯盟已經自願成為激進的宗教、困擾的能源政策以及不計後果沉迷於舉債信用的工具，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已經初步形成，但是只有到了 2004

年才作為書面形式發表。提出這樣的論點，我的出發點是對歷史的、宗教的和經濟的趨勢以及全球的歷史案例和對共和黨全國聯盟的命運有著同樣的興趣。白宮顧問卡爾·羅孚素有對歷史和選舉方面的敏感。但是，到了 2004 年，他致力於培育的共和黨聯盟卻成了其意識形態的變種，而我對於這個變種動態的熟悉早於卡爾·羅孚。

以宗教問題為例，雖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但是 2000 和 2004 年的總統選舉標誌著共和黨在美國歷史上變異為第一個宗教政黨。共和黨選民中這部分選民是在 2001 年“9·11 事件”之後支持共和黨的必要人群，而自那時候起，布什將自己對上帝的感受，上帝希望他成為美國總統等等說法，扭曲成為對國家更為嚴重的危機。

其次，石油問題不只是汽車、飛機、引擎和供暖系統；石油代表了美國在 20 世紀上昇為世界霸主的最重要的動力。在靠石油發達的美國之前，19 世紀的英國是以煤炭實現霸權而 17 世紀荷蘭的財富則依賴於對風力和水力的掌控。當整個世界從一種能源和動力轉向另一種領先的能源時候，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繼續維持其在全球的經濟領導地位。今天的美國，儘管華盛頓一再抵賴，已經將其海外的軍事佈防圍繞著石油——更強調保護油田、輸油管道和海上通路。這種傾斜政策在共和黨人的眼中是毋庸置疑而且合乎邏輯的。自 1960 年代以來美國南北分界的政治版圖分解之後，美國國內形成了一個新的共識，即美國能源工業的大多數力量，石油工業、天然氣工業和煤炭工業，都集合到了共和黨旗下。同時，在農村，小城鎮和城市郊區的選民也發生了同樣的演變，因為他們依賴於汽車和廉價的燃料來維持他們的家庭，工作和生活方式。

共和黨人在 1969 年以後專注於中東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平面。除了關注石油和恐怖主義問題之外，布什的白宮還迎合了“世界末日”傳教士以及神學士們，對於這些人來講，中東這片聖地是必爭

的基督教戰場和目的地。就這樣，這兩項訴求即石油和聖經教義指導下的期待決定了外交的和政治的錯位。而且這兩個追求都不可以在公衆面前公開承認，但這樣一個假象則由全國的媒體加以掩飾。

選舉顯示出來的必然結果，既令人刺激又令人髮指，顯示了近 25 年來共和黨總統選舉聯盟的異化。在布什登堂入室的過程中，從 2000 年尤其是 2004 年的選舉來看，有三個支柱變得十分重要：（1）石油工業和軍工企業；（2）宗教右派團體，加上其理論上的急迫感和衆多的追隨群體；（3）債務工業和金融界，他們代表了臭名昭著的股票莊家。2004 年 12 月《紐約時報》為爆炸性的公衆和私人債務的龐大商業體系加上了“舉債工業”的標籤。

那個標籤其實並不確切，但是我們無法再發明一個什麼詞兒來表述“信用卡~房屋抵押~汽車貸款~金融衍生產品~公司債券~公共借貸工業組合”。這是一個問題，而濫溺的行為依然在尋求一個能在選舉日那天使用得更為精準的假面具。無論如何，政府，公司，金融和私人貸款在過去 40 年中的急速擴大正好可以解釋為什麼金融界，追討債務的公司，可以變得如此強勢，超越了生產真正產品的製造業。這個國家正處在一個最危險的經濟轉型過程中。

作為總統，喬治·布什正是推廣了這樣的聯盟和支撐這個聯盟的價值體系。他的家族，在過去的四代人中，都與國內外的金融界，軍火工業和石油工業緊密相連。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基於他們所把持的行政當局的權力，他們又同宗教的權力中介人增加了聯繫。美國民衆中很少有人可以理解到布什家族對於共和黨的影響力。從 1980 到 2004 年期間，布什的名字一直在總統候選人或者是副總統候選人的名單上。這個問題我在上一本書《美國王朝》中已經比較詳細地敘述過。而本書的目標則不再注重一個家族的影響力而把重點放在經濟的，宗教的和利益集團的歷史以及他們的影響對於共和黨聯盟的作用。但是布什家族的人是不可小視的。

布什家族成員在過去 25 年中，通過總統職務，副總統職務，中央情報局長職務把共和黨慢慢地變成了本書所分析的三大議題的政治工具。直到 2006 年，這三個內容一直是共和黨政治的主要承載主題：石油為先決條件的國家安全體系；簡單化、遠征軍式的基督教義；和不計後果依賴信用借貸生存的金融業。雖然代表這三個內容的利益集團在共和黨內部不是經常有完全一致的意見，共和黨內部希望改革的成員會發現這個聯盟並不容易改變。在本書第一版的前言中我指出過，華盛頓共和黨人中受南部掌控傾向聖經教義的人們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江湖幫派，這個江湖幫派等同於當年在南部支持奴隸制度的（民主黨的）政治聯盟。當年控制華盛頓的這個聯盟一直維繫到 1860 年林肯當選總統後方才解體。2006 年的選舉結果，代表了第一場撥亂反正，但是清除其長期影響還有待時日。恐怖襲擊，或者與恐怖襲擊相關聯的戰爭會重新挑起自“9·11 事件”以來逐步平和的人民心理反應。

到 2006 年為止，美國的民主黨人有著他們自己的複雜問題。他們缺乏對自身和國家問題的理解同時也缺乏勇氣，這就幫助促成了共和黨在 2000 到 2004 年的變異。因為如果不是對手的虛弱和含混不清的反對行為，不論是在“9·11 事件”之前或者是在“9·11 事件”之後，共和黨的這種變異或許只能是非政治的，乃至於是不可能的。2006 年的選舉結果提醒了民主黨人，給他們推動力去真正成為嚴肅的反對力量。

美國的石油政治，激進宗教和舉債財經的危害性必須從當今的時局背景來分析。這些是實際的危害，而不是政治沿革中抽象的問題。但是，我必須闡明我本人從一個參與者變為擔憂者的過程來描述共和黨聯盟衰落的事實。40 年前，我開始寫一本書。那本書在 1967 年完成，我把那書帶到 1968 年的共和黨競選活動中去。那時，我擔任了首席政治和投票格局分析員。此書在 1969 年出版，當時

尼克森政府還是相當活躍。而《共和黨多數派的崛起》一書剛剛出版便相當有爭議。美國《新聞週刊》將此書定位為“尼克森時代的政治聖經”。

在那本書裡，我還創造了一個新詞“陽光帶”來描述從佛羅里達到加利福尼亞州那一長條含有石油、軍工、航天工業和退休人員居住的地帶。我當時提出的主要觀點就是美國南部已經開始主導共和黨的全國政治活動。40年之後，那本書描述的政治框架已經產生了三重的變異，而這個問題正是本書討論的重點。

有些演變始終是無法明言的。如果說美國某一個地區有可能產生強勢的，遠征軍式的原教旨主義，那就是南部各州。如果任何新的聯盟可以融合石油和軍工集團的利益，並促成他們互相靠攏結成盟友，那就是“陽光帶”的聯合。華爾街當然是共和黨的長期夥伴。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而言，城裡的紳士和時尚人物從來不熱忱於同那些鄉巴佬和美國中部地區的人士交往，更不用說與那些宣教主義的傳教士相處。2000至2004年間的聯盟的組成，實際上是很勉強的同床異夢，而且非常容易面臨嚴重的失敗。

我在《共和黨多數派的崛起》一書中，很少提到石油工業，部分的原因是由於我當時知道我要進入政府機關。但是，搞石油的人士還是喜歡我書中提出的觀點。在那本書裡面我有一個分析對今天的現實依然有參考意義。美國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工業儘管內部有不同意見，還是會成為共和黨聯盟中的“心臟地帶”區域。迄今為止，這些利益集團還是基於長久以來美國內戰時期產生的地方主義而有分歧。但是這些地方主義分歧會消失而且已經在消失。至於這個“年邁的”聯盟從2008~2020年會如何演變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幾年前我在英國研究經濟地理和歷史的時候，我不僅僅對荷蘭和英國的商業發展軌跡產生了極大的興趣，20世紀早期地理學家

哈爾福德·麥金達爵士的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理論也使我大受啟發。麥金達認為，控制了心臟地帶，就可以控制世界。我當時就想到，沿著逐漸模糊的美國內戰時期的分界線，會聚合起來一個“心臟地帶”，最起碼會控制華盛頓。

語言學家比爾·沙法爾在他的《政治學中的新語言》一書中對“心臟地帶”的定義中引用了麥金達的表述。他然後指出“政治分析家凱文·菲利浦斯將這個舊的政治地理觀念運用到美國政治中：1968 年的心臟地帶 25 州中的 21 個州支持了尼克森……本世紀的剩餘時間中，心臟地帶的各州，連同城市郊區，南部各州和受陽光帶影響的加利福尼亞州將會掌控美國的政治。”

那就是今天提出“紅色各州”的序曲。麥金達對世界的觀察在 21 世紀找到了新的亮點，今日世界為爭奪石油而發生的國際鬥爭圍繞著麥金達的歐亞大陸的主導理論而展開。在相同的背景下，美國從懷俄明，科羅拉多，到新墨西哥到俄亥俄，一直到阿帕拉契亞山脈的產煤各州（以及部分當年南方邦聯各州）成為從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形成的以化石能源主導的政治力量——一個碳水化合物的選舉聯盟。這些州的人們喜歡四輪驅動汽車和寬鬆的一氧化碳排放標準，支持對擁有鉅大石油儲備、但不聽從美國指揮、與恐怖分子眉來眼去的波斯灣國家實行先發制人的空中打擊（儘管是短暫的）。

由於美國已經不再擁有到處溢滿的石油資源，所以用軍事手段來解決能源危機也不能說是愚蠢行為。愷撒大帝和拿破侖對此都會毫不猶豫。最起碼來講，攫取充分能源資源的誘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論是愷撒大帝或是拿破侖都沒有面臨過笨拙而又同時受宗教支配的喬治·布什所面臨的困境：混亂的海外駐軍，其本身就是一個困境，常常轉回來成為一個財政的困境。布什當政的六年中，聯邦財政從收支平衡變為 1.3 萬億赤字。與此同時，美國在國際上借債四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人。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擔心，

考慮將他們的美元儲備轉為其他貨幣的儲備甚至轉為黃金儲備。歐洲和亞洲的銀行堆積了大量的美國印行的債券和綠色的欠條，他們開始喪失信心。這個債務的軟肋是與石油供應的軟肋共存的。

不幸的是，隨著美國的脆弱性暴露得越來越多，受布什影響的共和黨聯盟和基督教宣教派，原教旨派和聖靈派卻因此而掌握了超過 40% 黨內的選票。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相信，聖經中描繪的末日戰場將要出現。在中東的亂局，雖然不足以成為威脅，實際上宣示了耶穌基督的再生。石油價格的狂漲，兇殘的颶風，死亡的海嘯，和極地冰川的融化反而使這些觀念更具有可信度。

一群相信世界末日的選民，一個笨拙地追求波斯灣的石油的政府，一個官方多重的欺瞞行為，加上因信用金融危機觸發外國債主使美國經濟破產的可能性等等多重因素的互動絕對是美國的一場噩夢。也可能造成其他方面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眼看著美國的選舉格局形成的這種後果，對於一個在過去 40 年中研究、觀察和鼓勵這些變化的人來講，無疑是非常沮喪的。

40 年前，我在《共和黨多數派的崛起》一書中對南部的原教旨派很少提及。但是共和黨的新聯盟肯定會帶來北部天主教和南部新教徒的加盟。我當時對此並不擔憂。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我和共和黨中的多數意見一樣，認為自由派的非宗教的集團低估了宗教在美國影響的深度和重要性，這樣就給了保守派一個強大的合理的掌權的機會。

從那時開始，我對於宗教在美國的強勢性有了越來越深入的瞭解。美國宗教在 18 世紀和 19 世紀的鉅大影響實際上為 20 世紀和 21 世紀早期的宣敎主義浪潮留下了種子。1998 年，經過多年的研究，我發表了一部長篇作品《表親的戰爭》，研究三次英語國家的爭鬥：1640 年代的英國國內戰爭，美國獨立戰爭和美國內戰。在兄弟姐妹的相互殘殺過程中，選擇對手的非常重要的依據是宗教的

界分——虔誠教徒和清教徒與英國國教追隨者的界分，以及尚武的宣教派重新現身。這些衝突在美國的內戰中達到頂峰，他們的事業就是解放和新教徒的宗教改革。那本書的立意和分析是非常透徹的，以至於在出版當年就成為了普利策獎的最終候選。說實在的，我和內人對我們當時訪問的 18 世紀教堂印象很深，這些教堂包括在位於南卡羅來納州聖公會的彩繪、加勒比海地區的灰牆、到賓夕法尼亞州郊區的形似石頭堡壘般的長老會教堂和新英格蘭地區公理會的會議大廳，以至於還想繼續對這些教堂做個新的研究。

這就是宗教的持久的影響力。從 1960 年代之後，自由派代言人就力主將基督教推出公眾視野，而這個錯誤反而引發了宣教派，原教旨派和聖靈派的反擊。這樣的反擊可能還沒有達到其最高潮。本書的第二部分披露，神權統治的強大壓力從 1990 年代後期在共和黨的全國聯盟中就變得非常引人矚目。2000 年總統選舉之後，佔美國基督徒三分之一的人們相信末日戰場和聖經的絕對真理的力量。他們開始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政府對科學和進化論的態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我後悔等到 2004 年在分析布什家族的《美國王朝》一書中才公開抨擊剛愎自用的共和黨聯盟中的宗教成份。相比從 2001 到 2004 年間共和黨已經開始運作的事情來講，那時候已經太晚了。但是，當時全國媒體的大多數甚至比我還要遲鈍。

但是，從眼前而言，我們先看看本書中的具體內容。首先是石油問題。基於美國的現行政策，美國在能源業的領頭地位在未來的 20 到 30 年間就會結束。本書第一部分內含三個章節，我們應當結合下面幾點來閱讀：（1）背景。石油在美國國內發展的重要作用以及隨後的全球影響；（2）關於石油在美國捲入中東地區起了多大作用；（3）關於從 2008 到 2020 年間，在華盛頓任何一屆政府要從文化的、政治的和利益集團影響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的難處。最

好的分析起點就是目前由石油驅動的伊拉克戰爭中的困境。

勿庸置疑，贏得國會多數席位的民主黨聯盟力量的中心是在美國東北部和太平洋沿岸的各州。那些州在能源節約方面自然比與石油工業聯盟的共和黨要多一些節能方面的改革。但是，自從聯邦政府在 1980 年放棄了聯邦能源保護優先政策以來，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中，美國的人口分佈愈加擴散到城郊和鄉村地區而人口的分散是與汽車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汽車消耗了美國將近 50% 的石油需求。所以很難看到我們急需的大規模削減能源消耗的政策在短期內實行。如果民主黨有神奇魔棒的話，他們應當儘快使用了。

二、伊拉克：能源政策的災難造成了戰爭

在 2006 年 11 月國會中期選舉前幾天，喬治·布什警告選民，儘管有日益增多的傷亡和氾濫的瀆職，美國無法承受被擠出伊拉克的結局——石油，伊拉克的石油儲備是太豐富了，美國不能袖手旁觀。

此言真是“洞若觀火”啊！這樣，多年來的欺騙又回到了原點，至少讓部分真理做出姍姍來遲的虛偽的亮相。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歷史的重心是清晰的：英美人一直為位於伊拉克的一樣物品纏繞不休——石油。但是，當 2003 年美國和英國的大兵在伊拉克登陸的時候，那藉口完全是善與惡，民主與自由，以及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現在回顧起來，全部的媒體生生吞下了令人驚奇的官方謊言。2003 年 2 月，白宮發言人阿里·福萊徹代表布什發言時候說，“如果這個‘行動’是和石油有關，美國的政策應當是儘早結束對伊拉克的制裁，這樣石油可以儘快對外出口。不是這樣的。這是關係到保護美國人民生命的行動。”2002 年 11 月，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也發表了同樣論點：“這和石油完全沒有關係，確實沒有關

係。”

在大西洋的彼岸，英國首相布萊爾稍許精明而其實同樣無賴地對英國下院說：“請准許我回應有關石油的陰謀理論。此事根本不可能與石油有關。假如和石油有關的話，我們何不儘快與薩達姆·侯賽因做一個交易呢？”

這些話，當然是滾熱的馬糞而已。自然，石油不是一切。地緣政治、宗教也起到了作用。但是石油是關鍵。從加拿大的阿爾伯特到美國的德克薩斯，成群的石油業主議論著石油的重要性。而石油地理學家則在開會中談論峰值石油預測。峰值石油預測認為，達到全球石油開採的危險的峰值，只有 10 至 20 年時間。專業雜誌在討論如果拿下伊拉克的石油會使埃克森和雪孚隆這樣的公司增長多少利潤。而從歐洲到拉丁美洲到中東對普通人的民意測驗則表明，大眾都認為入侵伊拉克就是為了石油。

1991 年的海灣戰爭當然是為了石油。老布什總統在海灣戰爭的前一年就公開承認“假如世界的鉅大石油儲備落入薩達姆之手，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自由和我們友邦人民的自由都將遭難。”所謂薩達姆是第二個希特勒的說法，完全是宣傳用的詞語。即便在冷戰年代，華盛頓在擔心蘇聯的坦克開入伊朗從而抵達波斯灣的可能時，其內心的擔憂仍然是石油。

英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同樣沉迷於類似的謬論。英國外交大臣寇爾松評論說在對伊拉克新邊界的劃分上完全沒有石油的影響。他說：“在摩蘇爾的劃分上，石油問題從來不是我的考慮，也不是英王陛下政府的考慮”。到了 1924 年英國同意讓美國石油公司進入伊拉克，而寇爾松所謂英國給予阿拉伯國家自由和自治政府的說法在英國的下院和金融界受到嘲笑。

但那是 80 年以前的事情了。到了 2003 年以後，薩達姆手中實際不存在的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沒有使美國民意的精英

們對布什~拉姆斯菲爾德~布萊爾“與石油無關”謊言進行重新評估。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即使伊拉克戰爭與石油有關，美國其實在能源政策和地緣政治兩個方面都失敗了。

少數幾個不否認伊拉克戰爭與石油有關的官員中有副總統切尼。他是一個無法板著面孔說假話的人。1999年，當切尼領導著石油服務業大公司 Halliburton 的時候，他在倫敦石油研究所發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說。在描述面臨的石油供應困境的時候，切尼說：“根據估計，未來幾年對石油需求每年要增長 2%，而根據保守的估計，石油供應能力每年則下降 3%。這意味，到 2010 年我們需要每天增加五千萬桶石油生產。”

這每天五千萬桶的增量大部分要來自中東地區。幾年之前，《華爾街日報》報導說，主要石油大公司一致同意，未來石油儲備的大頭在伊拉克。2001年，切尼領導的能源工作小組花費了大量時間研究伊拉克的石油分佈圖，上面也標記了競爭對手國家，比如俄國、中國和法國。薩達姆本意也是想和這些國家達成開發石油的協議。明確的說，切尼領導的這個能源工作小組的使命就包括了考慮“佔領新的和現有的油田和天然氣田的行動。”

“佔領”正是 2003 年入侵伊拉克的主要動機。Paul Roberts 在 2004 年出版的《石油的終結》一書中說，切尼和他的同事“撲在伊拉克油田地圖上，研究戰後有多少伊拉克的石油可以立即投放到市場。戰前，伊拉克每天的產量是 350 萬桶。根據許多行內專家和政府專家的估計，到 2010 年，產量很容易可以上昇到每天 700 萬桶。假如這樣的話，美國控制下的伊拉克可以把最大的產能投放市場，無視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配額。而大量石油流入市場將實際上結束石油組織控制價格的能力”。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公司當然會處於最有權勢的地位。

與此同時，聲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同樣可以用來

作為制約爭奪石油的戰略作用。1990 年代早期，聯合國關於伊拉克的制裁條款中就有不准許將伊拉克的油田交給外國公司開發的內容。這從一方面給了俄國，中國和法國刺激來支持制裁。但是在另一方面，只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說才能使聯合國的制裁生效。假如沒有這個殺傷性武器，聯合國會立即撤銷制裁，而美國的競爭對手國家會很快得到他們需要的油田。那些鼓吹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存在的政府高官們肯定理解這個邏輯結果。

讀者不禁會問，為什麼布什和拉姆斯菲爾德不談談石油問題呢？老布什在海灣戰爭之前不是也談過石油問題嗎？從戰略上講，這次和當年有很大的不同。2003 年，沒有一個科威特需要解放，給入侵一個正義的藉口。2003 年是赤裸裸的入侵，推翻薩達姆，控制伊拉克。承認入侵與石油有關不僅僅在國內公關上有問題，也會在全世界產生問題。布什政府必須要一個更為緊迫的理由，而反恐戰爭則是一個很廣泛的口號。因此，包括布什總統在內的行政當局在每一個場合機會都要談論薩達姆支持恐怖主義，甚至影射他間接的與“9·11 事件”相關。

白宮還必須考慮當年把布什送上總統位置的強大的宗教力量。《新聞週刊》1999 年的民調披露，45%的美國人相信末日戰場和世界末日的說法，同等比例的人相信，反基督的邪惡已經來到地球上。由於這批信徒主要集中在支持布什的宣教派，原教旨派和聖靈派中，我估計 2000 年投票支持布什的人中有 55%的選民是相信末日戰場和世界末日的。有一位民調專家早些年估計，在支持共和黨的保守派人士中，大約有 58%相信末日戰場和世界末日。宣教派全國委員會的 Zogby 說，在蘇聯解體之後，宣教派已經把伊斯蘭教來替代“罪惡帝國”，穆斯林已經成為現代的“罪惡帝國”。據威斯康星大學歷史學家 Paul Boyer 調查，到了 1990 年代，相信預言的人們把薩達姆視為反基督或者是反基督的前哨，因為薩達姆

企圖重建古代罪惡之都巴比倫。原教旨派的傳教士 Tim LaHaye 出版了狂歡~苦難~末日小說系列得到鉅大的成功。小說系列銷售了 600 萬冊。而小說中反基督徒和新巴比倫的所在地就是在伊拉克。

政治上，白宮面臨著戰略上的兩難境地。從正面分析，相信聖經而支持布什的選民希望看到美國軍隊推翻薩達姆從而支持一個善與惡之間的戰爭。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說法可以作為一個有用的藉口，但是這個說法還不夠深入。在這個前提下，入侵伊拉克其實會引發宗教的內涵。支持以色列也具有宗教的動機。布什在“9·11 事件”之後的帶有濃重宗教色彩的言辭中已經擺出了一個發起全球“善與惡”戰爭的姿態。

這些說法的負面影響小一些，但是還是需要小心處理。白宮可以批評聯合國因為對於相信末日戰爭的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而石油則不在末日預言的框架之中。在 LaHaye 的小說系列裡，石油僅僅是反基督徒非主要的戰略用途，不是好人的主要武器。

上述宗教的因素對白宮到底有多大影響，可能永遠不可得知。但是事實是存在的，白宮在公開場合堅決否認石油作為發動戰爭的動機和目標。雖然很多人相信切尼的秘密工作小組有大石油公司的介入，但是隱藏與石油有關的戰爭計劃則是更為重要。

總結起來看，我們可以也應當用石油政策和地緣政治的標桿和結果來評審伊拉克的成敗，這才是公平的。核心的問題是，在 2002 年，當白宮還在策劃對伊拉克的入侵和佔領的時候，石油的市場價格是每桶 30 美元。到了 2004 年末，石油價格已經上昇到了痛苦的每桶 40 美元。到 2006 年春入侵伊拉克第三個年頭的時候，油價漲到了每桶 75 美元。從 2002 到 2006 年關鍵的五年中，美國本可以認真地研究其石油能源政策的時期，華盛頓卻相信了新保守主義派的神話，在伊拉克轉動其“幸運之輪”。

本書的第三章詳細介紹了有關伊拉克（以及相鄰的科威特）所

有的歷史細節都是和石油相關。可以這樣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伊拉克新邊界的劃定與石油有關；1941年軸心國從敘利亞入侵伊拉克是為了追尋石油；所有波斯灣地區重要的勘測都是集中於油田勘測；切尼在2001年研究的地圖是油田分佈圖；2003年當美國軍隊進入巴格達佔領的第一個伊拉克政府建築是保存有石油地質資料的伊拉克石油部大樓。

英美政治家們也越來越與石油相聯。布什的當選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總統和副總統都來自石油工業。英國首相布萊爾與英國石油公司關係密切以至於諷刺家稱BP（英國石油公司的英文縮寫）為布萊爾石油公司（布萊爾英文名字Blair與BP開頭大寫字母一樣——譯者註）。

再說，假如石油與入侵無關，為什麼政府官員在評論入侵的成果的時候一再提及石油？切尼認為，到2003年底，伊拉克的石油產量將達到每天300萬桶，而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勞倫斯·林賽在2002年9月發表言論稱“關鍵問題是石油。在伊拉克政權易手之後，世界石油產量會增長從而降低石油價格”。拉姆斯菲爾德在五角大樓的副手保爾·沃爾福維茨認為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可以償付伊拉克戰爭的所有費用。

本書首次發行之後，新的證據源源不斷。阿方西的新書《沙漠裡的圓圈：我們為何重返伊拉克》引用匿名政府高官的話說：“在外交政策圈子裡，最大的悲劇是阿富汗。”“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維茨設法說服了切尼伊拉克比阿富汗更重要。當然有各種不同的理由。至高一切的理由是，他們的推動力是認為假如在伊拉克有一個對美國的友好政權，美國公司就有伊拉克石油的安全通道。”在對世界貿易中心攻擊後的幾天內，布什在9月17日命令國家安全委員會研究“假如薩達姆攻擊美國利益的話，美國如何控制伊拉克的油田的計劃。”此外，在2003年3月美國攻擊伊拉克之前的日子

裡，布什在對國會能源和財經委員會的高層通報的時候，對即將垂手可得的伊拉克豐富的石油興奮不已。當時與會的不少民主黨人的手記中都有這樣的記錄。

我們在此可以清楚看到美國千瘡百孔的能源政策，其後果可以用三個標準來衡量：戰後不斷上漲的石油價格；石油生產國家對美元的抵制；和美國軍力投入到保護地面和深海油田，輸油管道和油輪和海路的比例不斷上昇。這些對於美國財經、軍事和地緣政治的壓力是非常殘酷的。

我們首先來看看政府當局非常天真的想法，認為如果佔領伊拉克可以讓市場充斥新的石油供應從而遏制石油生產國組織。在入侵的最初的幾個星期內，情況確實如此，當時的《金融時報》評論說，石油貿易期貨價格表明，到明年下半年，如果戰爭結束以後，石油生產國會向市場大量投放石油從而使得油價降為每桶 22~28 美元。當然，事實上伊拉克很快成為游擊戰和部落爭鬥的戰場。游擊隊襲擊並中斷了輸油管道和煉油設施。而運油卡車司機則拒絕從伊拉克北部運油。到 2005~2006 年冬天，伊拉克的石油產量跌落到每天 110 萬桶。這樣就把石油生產國組織成員中富餘的生產能力都佔用了，使得油價一再上漲。2006 年 4 月，阿布扎比石油研究院的 Abu Dhabi 對美聯社說，伊拉克的石油產量是舉足輕重的。伊拉克石油產量的下降是油價上漲的主要因素。

從宏觀經濟學角度觀察伊拉克的糟糕局面也是令人不寒而慄。美國經濟學家 Joseph Stiglitz 和 Linda Bilmes 在 2006 年 1 月對美國經濟學會演講中稱，根據他們的研究，伊拉克的混亂使得石油價格每桶上昇五美元。到了 2006 年底，他們的結論更為大膽：“我們相信，從戰爭開始以來，石油價格每桶上漲 45 美元中的絕大部分源於伊拉克戰爭的影響。”

毫不意外，世界上產油國家對美國的伊拉克政策非常不滿。在

2003 年入侵伊拉克戰爭之前的幾年，薩達姆的伊拉克一直堅持油價要以歐元而不是用美元計算。這同石油生產國組織從 1970 年代以來的做法是相反的。當伊拉克上空戰雲密佈的時候，石油生產國組織其他主要成員，伊朗和委內瑞拉也提出了相同的意見，歐共體組織高級官員也表達了相同意見。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美國《新聞週刊》以其獨有的率直評論道：“真正的衝突不在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是美元對歐元的衝突”“誰來買賣伊拉克的石油，以什麼貨幣來進行買賣——這是日益昇級的經濟衝突中的內容。”

倘若美國在伊拉克的勝利可以讓華盛頓控制並開放伊拉克的石油喉管，石油生產國組織將不得已而放棄談論用歐元替代美元來計價石油，或是用一攬子貨幣來替代美元。相反，在 2003 和 2004 年間，當美國在伊拉克失敗的各個方面越來越清晰的時候，其他國家，比如印尼，馬來西亞，和非石油生產國組織成員的俄國也開始更加尖銳的批評以美元計油價的制度。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的六個月，面臨對採油設施持續不斷的破壞和反叛行為，伊拉克的石油產出日益下降，就連沙特阿拉伯也開始表示不滿。但是他們表達不滿的方式不是針對計價貨幣發表意見，而是把一個鉅額的石油開採合同給了法國的道達爾公司而沒有給美國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到了 2006 年底，石油生產國一片欣欣向榮，並在考慮接納安哥拉，蘇丹和厄瓜多爾為成員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美國佔領了伊拉克，但是看來是石油生產國組織而不是美國具有最大的影響力。

到了 2006 年，美元再次貶值，此中一個越來越顯而易見的因素就是華盛頓能源政策的失敗——美國人每年需要花費 3000~4000 億美元進口石油。假如石油生產國組織不再用美元計價，那麼匯率造成的額外負擔會使得美國人從冬季取暖到開車上班處處感到壓力。到了 2006 年末 2007 年初，石油生產國組織不定期的會議上，美元的命運成了主要的話題。

此外，美國武裝力量用於保護海外石油通道的比重日益增高。Michael Klare 作為著名的研究資源戰爭和石油地緣政治的學者計算了五角大樓部署的與石油相關聯的軍事行動並且戲稱為“美國武裝力量慢慢地確認無疑地轉型為全球的石油保護軍”。這些由納稅人提供的軍費如何對納稅人支付的油價產生影響呢？每加侖 25 美分？40 美分？還是 85 美分？

儘管副總統切尼在 2001 年就已經把所謂“頂峰理論”專家提出的危機資料運用到了對伊拉克戰爭的部署計劃中，政府當局卻拒絕對此發表評論。美國頂尖的石油分析家，Weeden 公司的 Charles Maxwell 在 2006 年把美國石油供應的日益捉襟見肘比喻為套上了絞索：“1920 年，我們在全球範圍內新發現的石油儲備是 100 億桶而我們使用了 15 億桶；1964 年我們新發現的石油儲備達到頂峰，當年的發現是 480 億桶而我們使用了 230 億桶。到 1988 年，我們發現了 230 億桶，使用了 230 億桶。交叉點就是在那一年。從那時候起，我們發現的越來越少，而用去的越來越多。到了 2005 年，我們新發現儲備是 50 億桶而我們卻消費了 300 億桶。這些數據實在是令人窒息。”

當然，資源保護主義者們，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亞州和東北部各州，可以從 2006 年的選舉結果中看到一線希望。但是，我們已經浪費了太多的時間，而對石油的高度消費在美國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人口分佈上是如此滲透，我們很難對此樂觀。

三、美國面臨第二次“審判猴子”的分水嶺嗎？

對 2006 年選舉結果中宗教影響的確切詳盡分析尚需時日，但是 2005 至 2006 年間積累起來的一系列窘迫事件在 2006 年的選舉中突出表現出來。這和 1925 至 1929 年的歷史事件有驚人相似之

處。當時公衆對原教旨派的嘲弄，突出表現在“審判猴子”，Mencken 和 Sinclair Lewis 的著作，以及把“禁酒時代”的虛偽和失敗稱之為“高貴的實驗”，諸如此類，大大削弱了當時基督教保守派在政治參與中的功效，把保守派從政壇上逼回到教堂裡面壁。

喬治·布什在 2004 年連任總統之後，保守的宣教派和原教旨派的自信達到了頂點。他們以衆多的人數和狂熱的參與部分地支持了布什的連任。自那以後，對白宮和右翼集團的首次斥責發生在 2005 年 3 月在具有爭議的 Terry Schiavo 審判（該審判涉及法院是否同意拔去植物人 Terry Schiavo 生命支援系統。布什政府和教會右派堅持用聯邦法院管轄權進行審議，他們可以對此施加影響——譯者註），根據不同的民意測驗，估計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民衆反對國會和總統通過立法將屬於地方的審判權移交聯邦法院。選民們還抱怨說為宗教右翼利益集團在華盛頓的影響太大。然後，在 2005 年後期，一個聯邦巡迴法院判定，賓夕法尼亞州多佛地區受共和黨控制的學區把“智慧設計”（人類是上帝智慧的設計——譯者註）的課程作為當地學校的進化論的科學教材的補充課程是“從憲法角度看是不可接受的”。主審法官 John Jones III 雖然是共和黨人，卻判定這種做法是偏重於某種特定的基督教教義，不適合用於講授科學的課堂。

2006 年冬春之間的共和黨內部選舉結果顯示了不確定的政治信號。在關鍵的俄亥俄州，宗教右翼為了取得黨內的控制權，依賴牧師領導的組織，例如通過“愛國牧師”聯絡網的“重建俄亥俄項目”。另外有個組織是受信仰復興主義（Revivalist）傳教士 Rod Parsley 領導的“俄亥俄改革專案”。這個派別推舉的候選人，州務卿 Kenneth Blackwell 在 5 月份的州選舉中取得勝利，他的對手是民主黨提名的衆議員（同時也是衛理公會的牧師）Ted Strickland。在賓夕法尼亞，共和黨參議員 Rick Santorum，作為領軍的保守派，

輕鬆地贏得了再次提名。在南方，真實信徒們在重新提名阿拉巴馬州長 Bob Riley 時有點畏縮。Bob Riley 在 2003 年的時候，以耶穌基督和耶穌教誨的名義，提出要把州的稅負重點從窮人轉移到富人。他的提議當年沒有成功。但是，三年以後，Bob Riley 輕鬆地贏得了共和黨提名。他的對手是前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Roy Moore。Moore 在當法官時，在州法院中矗立了一塊鉅大的舊約十誡花崗石碑。他的神治哲學認為，美國的法律體系應當以基督教“十誡”為基礎。這自然讓選民們反胃，儘管這是在美國的“聖經帶”地區。

關於這個爭議的書籍層出不窮。我本人的《美國的神權統治》在 2006 年 3 月出版。同月，歷史學家和神學家 Garry Wills 出版了《耶穌講的是什麼》，書中指出，耶穌的教誨與那些宗教右翼的言論是直接衝突的。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 5 月出版了她的新書《帝國與萬能的神》，書中擔憂宗教與美國外交政策現正危險地交織在一起。記者 Michelle Goldberg 在《王國的來臨：基督教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書中描繪了宗教保守派如何迫使國家和教會之間的界限消失。在 11 月全國選舉之前，更多的相關題目的書籍出版。

2006 年夏末，保守派的另一位主要領導人，曾經擔任過 Pat Robertson 旗下基督教聯盟執行董事的 Ralph Reed 在喬治亞州關鍵的初選中失利。這個被稱之為“神童”的人在擔任了州共和黨主席之後，想謀求副州長的職務（或許還會走出州府大院謀求白宮的職位）。他的宣教派的同事們對他與院外活動家 Jack Abramoff 以及 Abramoff 在印地安部落賭場的業主結盟感到憤怒。約有 500 萬美金的顧問費付給了 Reed，以幫助他勸說基督教保守派反對其他賭場業主提出的議案，從而為與 Abramoff 關聯的印地安部落的賭場提供方便。Abramoff 後來因為其他問題而被定罪。8 月，Reed 徹底落選。

秋季的競選活動也有很多與宗教有關的爭議。一個是逐漸得到披露的有關伊拉克的欺騙和敗局。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這個問題慢慢演化為不僅僅是外交政策的錯誤，也成為了一個道德和對聖經解讀的問題。此外，有四項主要爭議關聯到宗教，道德，醫藥和科學交叉的領域：（1）即使是當母親的生命岌岌可危的時候，還是要禁止人工流產（此議題正式列入南達科達州的選票中，而在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均得到宗教右翼的強硬派支持）；（2）批准進行幹細胞研究（正式列入密蘇里州的選票，同時也是該州美國參議員選舉的重要議題，在威斯康辛州，愛荷華州，和密西根州州長的選舉中列為重要議題）；（3）同意或者禁止同性戀結婚（正式列入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愛達荷州，南卡羅來納州，南達科達州，田納西州，弗吉尼亞州和威斯康辛州的選票，同時在密蘇里州，弗吉尼亞州和田納西州推選美國參議員的選舉中相關）；（4）所謂“智慧設計”和進化論之爭（在俄亥俄州學區董事會的選舉中成為焦點議題，在賓夕法尼亞州推選美國參議員的選舉中成為隱含的議題）。後來選舉結果證明，每一個爭議都對選舉產生重大影響。其原因是這些爭議激起了中立選民的不滿從而參與投票。總的說來，這些爭議成了公眾選擇的分水嶺：宗教在政治中應當扮演什麼角色。

甚至到了夏末，還沒有人能夠預測選舉的結果會朝哪個方向一邊倒。作家 Frances Fitzgerald 在一篇對俄亥俄州長選舉以及選舉結果對基督教右翼的影響相當精細的分析中預測，共和黨人 Blackwell “將成為俄亥俄州的州長”。但誰也沒有預料到支持民主黨的浪潮如同海嘯般撲來，而相鄰的賓夕法尼亞州的情況也是如此。事實上，選舉過後的分析評論顯示，無人預見到新的反對勢力及其強大的力量。

在秋季各州的選戰中，一批新書出版了，對宗教右翼進行解釋，

評論或是披露內幕。前保守派雜誌工作人員 Damon Linker 出版了《神權主義保守派：對宗教平等的美國處於困境》一書，批評了躁動的天主教右翼的極端觀點。著名的保守派評論員 Andrew Sullivan 發表了《保守主義的靈魂》，通過揭露的分析認定共和黨已經成為“也許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本質上的宗教政黨”。前密蘇里州美國參議員 John Danforth，他本人又是一位牧師，在他寫的《信仰與政治》一書中認為，重新脫胎的共和黨已經“不是傳統的共和黨人與基督教右翼的平等合併”，而是“一個被基督教右翼兼併了的共和黨”。

記者 Lauren Sandler 發表了《自認正確：從宣教主義青年運動發回的報道》，回憶了她在“改變世界者大會”到“新生活教會”的詳細生活。哥倫比亞大學神學教授 Randall Balmer，其本人也是一個宣教派，發表了《王國來臨：宗教右翼如何扭曲信仰並危害美國》。他在書中說，宗教右派“劫持”了美國的宣教主義派。曾經在白宮“信仰工作小組”工作過的 David Kuo 出版了《迷人的信仰：政治誘惑的內幕故事》。在書中他披露說，白宮的政治顧問私下裡稱那些宣教派支持者為“瘋子”和“傻瓜”但仍然追求他們的選票。

2006 年各種文章對喪失理智的宣教派的狂轟亂炸大大超越了以前中期選舉中的零星火力。另外，與宗教右翼保持緊密聯繫的候選人反而由於在右翼極盛時期的所作所為在競選中揹上了累贅。例如，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員 Rick Santorum 出版過《這需要一個家庭》一書，提倡居家教育並主張女人應當呆在家中而不是出去工作。民主黨興高采烈地把他在電視上訓誡職業女性的說教作為攻擊對象。俄亥俄州的 Blackwell 為傳教士 Rod Pasley 的《不再緘默》一書著文吹捧。《不再緘默》一書中斥責同性戀，還鼓吹消滅“假宗教”伊斯蘭教。過去贊同過這樣觀點的許多候選人因為他們的激

進主義立場的暴露而拖累他們的選戰。

對共和黨自命正確和誠摯形象最沉重的打擊發生在 9 月末。共和黨眾議員、眾院失蹤和受虐兒童小組委員會主席 Mark Foley 被指控與國會山少年侍從發生不良言辭和關係而辭職。一些共和黨的國會領袖，包括眾議院議長 Dennis Hastert 也被指控為失察甚至包庇這些行為。甚至 Hastert 本人也險些下臺。到了選舉的前幾天又發生了 Ted Haggard 辭職事件。Haggard 是擁有 1.4 萬成員的科羅拉多溪流市新生活教堂的牧師，也是由 4.5 萬個教會組成的宣教派全國委員會的總裁。他被迫辭去教會和全國委員會的職務的原因是他被發覺和一個男妓保持了三年的關係。

到了 11 月 7 日選舉日那一天，雖然預測認為選民參與率會很高但是實際上遠遠低於“總統選舉日人數”。大約 40% 符合選舉年齡的美國選民參加了投票，與 2002 年的中期選舉的投票人數相當。與 2004 年相當多帶有保守傾向的選民參與相比（當年有 57% 符合投票年齡的選民投票），到了 2006 年這個現象沒有重現。而且具有宣教派和原教旨派傾向的白人選民參與的人數也沒有增加。當然，關於這個方面的統計資料從來就不那麼準確。憤怒的獨立派和溫和派人士當天佔了主導地位，領頭的則是天主教徒和曾經在 2000~2004 年支持共和黨多數派而轉為反叛地位的主流派新教徒。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人中間可能很多人倒是因為共和黨動員了“掃街隊”而出門投票的。

為了評估 2006 年選舉結果，有四項標準需要考慮：（1）自由派和保守派相對比較存在的激情和參與程度；（2）進步派人士對道德行為的重新定義；（3）新的選區分佈以及（4）宣教派和原教旨派成員從失望到退卻的前景。

激情和參與從來就帶有自由派的色彩，但是這次選舉中真正動員起來的則是由於中間派以及溫和派對共和黨的反感。他們在 2004

年投了共和黨的票而到了 2006 年則將選票投向民主黨。雖然全國總統選舉參與的人數在 2000 和 2004 年之間大幅增加，但在 2006 年國會的中期選舉中，選民的參與人數基本與 2002 年持平。在參與人數急劇增加的地方，比如在俄亥俄州（選民參與從 38% 上昇到 44%）和弗吉尼亞州（從 28% 上昇到 44%），增加的人數主要是民主黨人。他們對伊拉克問題和宗教右派感到憤怒。保守派宗教領袖例如 Paul Weyrich 和 Richard Viguerie 本身對現狀也表示厭惡。他們預計宗教保守派參與投票的人數會大大低於 2004 年。10 月份的統計數字證實了這一點。Weyrich 對記者說“難為情的共和黨人”會呆在家裡。他說，“如果共和黨一旦贏了這個選舉，那只能說上帝是共和黨人。因為除非奇蹟出現，共和黨是無法贏得選舉的”。俄亥俄州在月中的一個民調顯示，共和黨參議員 Mike DeWine 的支持率與布什總統兩年前的支持率比較差了差不多 20 個百分點。這是共和黨支持率整體下降的標誌。10 月，Pew 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大約 57% 的宣教派選民表示將支持共和黨，與 2004 年的數據相比下降了 21 個百分點。到了選舉日那一天，全國電視網絡對投票人的調查顯示，宣教派選民對共和黨的支持從 2004 年的 78% 下降到 71%。雖然共和黨爭取選民出門投票的努力以及新澤西最高法院 10 月 27 日判定同性戀有權結婚的結果使得投票人數有所增加。

對於道德目標和聯盟的重新定義是民主黨取勝的關鍵。布什在伊拉克的失敗，包括與此相關的聖經預言的空洞譬語，成為布什的包袱。進步派聯盟，比如“美國選舉人協會”和“天主教共同事業聯盟”都把伊拉克和貧困問題作為選舉中的宏觀課題來討論。

新的選區分佈實際上是大大有利於民主黨。弗吉尼亞州由於華盛頓郊區的擴大，已經實際上成為一個北方州。南部大部分還是共和黨的地盤。但是在新英格蘭各州，紐約，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州

是美國國內宣教派和原教旨派最少的地方。共和黨在那裡潰敗。

宣教派和原教旨派成員從失望到退卻的前景是十分現實的。選舉結束後大量的評論、分析和建議都指向這個方向。前白宮助手 David Kuo 在書中披露，共和黨的選舉班子把宣教派成員稱之為“瘋子”。選舉結束後的民調表明，大約有 40% 的宣教派成員表示他們會用兩年的時間暫緩參與政治活動。

這樣的結果倒是給了民主黨人和自由派良機，可以不必為澄清右翼或者重生主義宗教的對錯而煞費心機。他們可以集中精力來拓寬宗教道德觀的內含，包含對戰爭、貧困、環境保護方面的內容。

四、喬治·W·布什是神權統治的總司令嗎？

我原來對使用“神權統治”一詞並非嚴謹。在首版發行的時候我在序言中寫道：

美利堅合眾國太大，太多樣化，無法與 John Winthrop 時代（John Winthrop, 1588~1649, 是英國最早期移民的領袖之一。1630 年他帶領一批新教徒在新大陸登陸，並把波士頓定為殖民地首府——譯者註）的馬薩諸塞灣的殖民地，或是 16 世紀紐約州的日內瓦，或是 19 世紀的猶他州來相比。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擁有近三億人口和承擔國際上的鉅大責任。很不幸，由於 2005 年間美國政府的表現，美國已經朝著通向神權統治的道路越走越遠：一個民選的領袖認為他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上帝發言，一個執政的政治黨派代表了宗教的真實信徒還企圖動員教會的參與，許多共和黨內的選民確信政府應當受宗教指引，更重要的是，白宮對國內外事務政策的執行具有宗教的意圖和聖經的世界觀。

此言不錯。但是進一步反思，我認為應當更深入。由於我的這本書企圖審視更廣泛的經濟，政治和歷史的趨勢而不是再次檢討布

什家族的影響，因此對神權統治的定義的檢討應當更加符合作為總統的布什個人的行為和心理的狀態。請看下列的定義。

Webster 字典的定義：神權統治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基於直接的神授的指導或這個政府的官員是直接受神的指導”。Onelook.com 詞典手冊描述神權統治是指“由神指導的一個政治單位（或者其官員是受神的指導）”。對於以文字為生的人來說，這意味著“一個由神父或相信由神支配的人們控制的政府體系”。許多使用這個詞的人，包括那些詞典的編撰人，常常習慣把神權統治（theocracy）和僧侶統治（hierocracy）相提並論，但後者指的是由神職人員施行的統治。美國的選民，學術人員以及評論員們從來就沒有想過他們會面對一個具備這種素質的總統。美國歷史學家，研究總統問題的學術泰斗亞瑟·斯萊辛格在 2005 年發表的論文稱：布什是美國歷史上最具有攻擊性的信教的總統。雖然他自稱宗教是他私人和個人的信仰，他卻置媒體的抗議於不顧，努力把美國總統這個迄今為止世俗的職位修改成為一個“以信仰為基礎的”總統職位。這在過去的歷任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國憲法從未規定過的。

布什本人也數次提及上帝對他的政治野心的支持。這些評論是記錄在案且無可爭議的。2000 年在對南方浸禮教大會的演說中，他說“上帝希望我成為美國總統”而且他對休斯頓的一位牧師說“我相信我是受上帝召喚來競選總統的”。根據另外一個人的回憶，他在對德克薩斯傳教士 James Robinson 說“我感到上帝希望我競選總統。我無法解釋清楚，但我能感覺到國家需要我……我知道這對我和我的家庭都不會是一件易事，但是上帝要我這樣做”。鑒於上面所提到的定義內容，同時根據對布什的信仰觀察以及下面將要提到的政治病理學家的判斷，我們對此的討論必須深入。布什說自己是上帝的選擇的感受看來遠遠超出了布什只是為了自我拔高

形象的一種做法。

至於說布什明顯的自我吹噓的救世主形象的說法，我在《美國王朝》一書中已經有所評論，在本書中也有涉及。神學家 Bruce Lincoln 對布什奇怪地引用“重生”這個詞來表述紐約市的重建工作也表示詫異。但我認為有必要從更廣泛的角度看這個問題。Bob Woodard 在他的《布什在戰爭中》一書中評論說，“總統認為他的使命和這個國家的使命都是上帝規劃的”；神學家 Martin Marty 聽到布什說“他對執行上帝的意旨表達了堅定的信念”不禁皺起眉頭；記者 Georgie Anne Geyer 在美國入侵伊拉克的當月評論說，總統入侵伊拉克“主要是由於對宗教的迷戀和迷信個人的偉大使命”。

助理國防部副部長 William Boykin 準將宣稱：“布什能夠在白宮是因為上帝把他派到那裡去的”。布什對此感到欣慰而不是惱怒。Boykin 此後繼續留任，而且繼續穿著軍服到教堂裡去。當人們問到布什在伊拉克的問題上他是否徵求他父親，第 41 任美國總統的意見時，布什發表了他著名的評論：“你知道，他不是我尋求力量的那個父親。在更高的地方我有個父親可以去尋求力量”。

2005 年，《美國保守黨》雜誌徵集並評論了大量傳統保守派人士對當年布什挑戰性的國情咨文的負面看法。那篇國情咨文是在一批狂熱的新保守主義者協助下撰寫的。國情咨文的內容相當晦暗，借用了俄國作家費奧多·陀斯妥耶夫斯基《被佔有者》的語調，其救世主般的激進主義令人寒戰：“以我們的努力，我們燃起了一團火焰，一團在人類心中的火焰。火焰為感到其威力的人們送去溫暖，火焰將燒毀企圖阻擋它前進的人們。而有那麼一天，這團無法撲滅的自由之火將燃遍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曾經是里根總統撰稿人的 Peggy Noonan 擔心布什反映出來的“使命沉醉感”而尼克森中心總裁 Dimitri Simes 則直接了當地說“假如完全從字面解釋布什的意圖，這意味著我們在白宮有一個極端分子”。《美國保守

黨》雜誌文章的作者，自由派人士 Justin Riamondo 認為，對布什言論的最好解釋可能是他有著嚴重的性格異化：“嚴重的幻覺”和“誇大狂”。

部分醫學界人士同意這樣的觀點。華盛頓的心理病理學家 Justin Frank 醫生在 2004 年出版了《布什在心理醫生的榻上》一書。他的結論是，布什患有未經治理的“幹”醉態（否認，過度反應，自認偉大）和自大狂相關聯的精神錯亂，比如疑心和“保護性的幻覺”。這些結論很有根據。但是，因為文章是寫給公共大眾看的，所以文章沒有列入醫學上的細節，也沒有引用同行的評語。這很不幸，因為 Frank 醫生的診斷正好說明布什身上存在的自認偉大和宗教幻覺的嚴重問題。

根據 Frank 醫生的分析，偏執和保護性幻覺常常造成誇大狂：“這種特質正是布什不同於其他總統的地方。其他總統對權力也都有強烈的慾望但是布什的問題是他在心理上是一個自認為全能的具有無上奇蹟般力量的自大狂”。“布什能夠上昇到權力的頂峰是他公開表明的沉溺於在生活中對秩序的要求和接受基督教神聖精神交互作用的結果。布什已經令人驚訝地公開宣稱他認為自己是在執行上帝的使命，而且他相信這是一個神聖的任務。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最為強烈的政治、心理和信仰的綜合作用”。

我們可以認定，對布什心理分析的材料同樣也會在國外的保密檔案中存在。國際情報組織，包括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長期以來一直花費鉅額經費收集和研究的針對國外領導人的實用心理分析診斷。根據 CIA 個人性格和政治行為分析中心創始人 Jerrold M Post 醫生的說法，“美國對境外領導人個人性格對政策的影響的分析早在 1940 年代就已經開始了”。

外國情報機構假如還沒有開始收集領導人資料的話不妨看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心理學家們在 2006 年初發表的針對美國總統的

研究報告。Johnathan Davidson, Kathryn Connor, 和 Marvin Swartz 運用心理醫生常用的《精神失常數據手冊》的評估標準分析了可以收集到的有關從喬治·華盛頓到理查德·尼克森歷史和醫學證據。在 37 位總統中，有 18 位或多或少存在精神性疾病。更有甚者，在 18 位有病的總統中，最少有十位是在位期間有發病的跡象。沒有例外，疾病影響了他們的工作。

杜克大學的研究報告沒有包括福特總統，卡特總統，里根總統，老布什總統，克林頓總統和小布什總統。因此我們無法應用三位教授的方法來分析後面的六位總統。不過假如按照前 37 位總統的得病比例，後面的六位中的一半可能會有病。或許會有一家大的美國雜誌或報紙派一名醫學記者，帶著《精神失常資料手冊》運用網絡的 Google 和 LexisNexis 就可以開始工作了。研究這個問題應該說是和美國憲法休戚相關。美國憲法第 25 修正案有一條相當繁雜的規定，假如總統不能執行他的職責的話，可以將他罷免。但這個定義是很不準確的。根據杜克研究報告的比率，假如在 37 位總統中有十位在職期間發病的話，也許強制性退休應該是比較有益的方法。

在進行了對假設大前提的分析之後，我們可以轉為關注兩項具體的實例。這些實例應該已經被英國的軍情五處、以色列的摩薩德、法國的國家情報局以及克格勃今日的機構，俄國的聯邦安全局收集到了。

不管喬治·W·布什在 1999 和 2000 年是怎麼想和怎麼表述上帝是通過他工作，他的這種“受命者”的感覺在“9·11 事件”之後大大膨脹了。在經歷了最初的吃驚和困惑之後，他對危機的反應是使用了濃烈的宗教言辭並取得了在阿富汗成功的軍事行動。這樣他在某些民意測驗的調查中的支持率達到了 90% 以上。當年 11 月份，《華盛頓郵報》在華盛頓特區和弗吉尼亞州基督教保守派領導人中做了一個調查。調查的課題是誰將取代 Pat Robertson 成為新的

宗教右派的領袖。調查的結果是令人震驚的兩個方面：一個方面顯示上帝肯定知道在危機的時刻布什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個方面顯示美國總統布什應當成為宗教右派的領袖！至此，讀者必須重溫前面提到的關於神權統治的關鍵定義：一個政府其領導人是以上帝的名義說話或者說這位領導人自己認為他是以上帝的名義說話。

從“9·11 事件”到布什 2005 年發表國情咨文，有兩個報道表明布什可能就是迷醉於令人擔憂的幻覺和自我誇大症狀之中。第一個報導是布什在美國航空母艦林肯號上宣佈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成功之後，6 月 4 日在約旦舉行的首腦會上對巴勒斯坦領導人說的。據報導，美國總統對巴勒斯坦領導人說，“我是受上帝使命的驅使。上帝告訴我：喬治，去阿富汗打擊那些恐怖主義分子。我做到了。然後上帝對我說：喬治，去伊拉克結束那裡的獨裁統治……，我做到了。現在上帝又告訴我，去幫助巴勒斯坦人建立他們的國家，在中東給以色列安全。啊，按照上帝的指令，我會做的。”

以色列的報紙《Haaretz》最早於 2003 年 6 月 25 日報導了這些言辭。巴勒斯坦總理阿巴斯和當時的外交部長 Nabi Shaath 根據他們手中會談紀要在英國廣播公司錄製的採訪中也引用了這些話。採訪記錄片於 2005 年 10 月播出。白宮對以色列報紙的報導以及後來《華盛頓郵報》的報導都沒有發表評論。

但是，在 2005 年英國廣播公司即將播出採訪記錄片並且將內容的文字材料送白宮徵求評論的時候，白宮通過新聞發言人 Scott McClellan 否認布什的言論。

兩位巴勒斯坦領導人對此的反應是他們重複了自己的看法但表示他們並沒有把布什的言論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10 月 7 日，阿巴斯在英國廣播公司阿拉伯語的節目中說，“布什總統說上帝指引他應當怎麼做。依據這個指引，他在 9·11 事件之後去阿富汗趕走恐怖主義分子，並指引他去伊拉克與獨裁者鬥爭。”但是白

宮並不接受這個說法。白宮發言人 Ken Liasius 對《三藩市紀年報》記者說，“這個討論從來沒有發生過”。

也許是阿巴斯後來受到某種壓力，他後來否認自己說過的話。華盛頓的媒體後來也不再追究這個事情了。

2004 年 7 月，布什好像又重複了他的類似言論。在他去賓夕法尼亞州鄉村訪問門諾派（Amish）聚居地的時候，他在一個大穀倉裡與一批門諾派人士說“我相信我在替上帝說話。如果不是這樣，我就無法工作。”由於當時沒有新聞記者在場，因此這個發言無法得到任何政府官員的確認。

嚴格的講，布什對巴勒斯坦人的講話和他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講話都是非直接記錄。不過按照法律程序，非直接記錄在法庭上也可以接受，只不過不是去證明其內容是否屬實，而是來證明他當時確有發表過相關內容。我的假定是，當布什的誇大狂症發作期間，他確實發表過替上帝說話或者按照上帝意旨行事的言論。根據杜克研究報告，另外一個美國總統詹森也有過相似“上帝告訴我”的說法，但證據也是非直接記錄。在詹森下令轟炸越南的時候，據奧地利大使 Ernst Lemberger 博士回憶，詹森對他說，上帝“在早上兩點來到我這裡對我說話，而我從上帝口中得到要不要轟炸的命令。”在結束這個話題之前，我想提請各位注意布什個人的宗教信仰不恰當的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中東的外交政策。這包括對伊拉克的入侵以及布什的宗教的世界觀，對聖經的忠誠，以及他個人對激進的“天命神授”的神學觀。在這個觀念基礎上，世界末日將會帶來苦難、末日戰場，然後耶穌基督會重回耶路撒冷帶領一個千年帝國。

2006 年 3 月 20 日是本書出版的日子。當天在克利夫蘭的城市俱樂部布什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在會上，當地的一個律師首先提問。因為看過了我的書，並知道我的觀點認為布什的白宮是偏向

基督教預言並相信末日戰場的，所以他對布什的問題是他是否相信創世紀。布什開玩笑說，他是一個求實的人，不過他稀里糊塗講了四分半鐘卻始終迴避提及創世紀、末日戰場、世界末日，或者《啟示錄》。這個傢夥都不敢說“是”或者“不是”。

讀者會發現，我在本書中用大量篇幅討論了美國選民。共和黨人和支持共和黨的選民確有很大的比例相信末日戰場、世界末日、聖經絕無謬誤以及相信宗教應當成為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導。很清楚，這就是布什支持者中的大多數，在 2002~2003 年投票支持布什，直至 2004 年。同樣重要的是，證據顯示，布什在有關中東問題上與支持他的選民有共同的想法，並且對這些想法付諸實施。2004 年，布什的支持者 Peter Schweizer 兄弟出版了一本紀年史。在書中他們援引了一個家庭成員的說法：“喬治認為這是一場宗教戰爭。他的觀念是：如果他們要殺死基督徒，我們基督徒就要用更多的武力和決心反擊他們。”布什的受上帝驅使的感應有沒有與《啟示錄》中的預言相符？Schweizer 書中的引言是否標誌了布什對末日戰場的信仰？不盡然，但還是有其他證據可以進一步討論。

布什迴避正面答復的這個問題在 2006 年 3 月的記者招待會之前就有發生。2004 年總統選舉前兩個星期，《華盛頓郵報》分析說，白宮不願意評論“布什總統是否讀過《遺留在後》（保守派基督徒寫的一本書 — 譯者註）儘管布什總統很自豪他是位重生派（Born-Again）的基督教徒，但他對特定的宗教信仰的評論很小心”，這也說明，布什或者接近他的宗教界朋友同樣也不願意接受媒體的採訪。

人們尤其關心布什是否相信千年後基督重生的教義 — 一個世界末日的信徒，同時將這種信仰實施於中東的政策中去。宣教派傳教士，前總統顧問 Charles Colson 在入侵伊拉克的前夜表示擔心說：“有的人認為，布什總統可能受宣教派教義的影響，認為世界

末日的戰爭就會在以色列和它的敵人之間展開。對於一個總統來說，偏重於某一個特定的宗教理念並把它運用於國際事務中是非常危險的。”在同一個月，溫和派新教徒的週刊《基督世紀》認為，“美國人民有權利知道他們總統的信仰在形成公共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因而在對伊拉克的構想中更有必要讓公眾瞭解他的信仰問題。”公眾輿論也提出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假如布什總統相信世界末日到來，那他會真的擔憂諸如全球氣候變暖、石油枯竭、可替換能源、債務、或聯邦赤字的問題嗎？在歐洲，還有許多猜想。前德國總理施羅德在他的回憶錄提到，他在與布什的討論中感到宗教是布什很多的決策背後的主要推動力。“我們正確的認為，在多數伊斯蘭國家中，社會宗教和法治的界限往往不能清楚的區分。但是我們沒能意識到，在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原教旨派對聖經的解釋也有同樣的趨勢。”美國的主流媒體應當認真採訪一下施羅德總理，探究他隱含的意義。

即便如此，有些相關的資訊還是引起了公眾的注意。美國宣教派全國協會總幹事 Kyle Fisk 認為伊拉克戰爭是給予宗教傳教士的機會。他說，“伊拉克將成為向伊朗、利比亞和整個中東地區傳播耶穌基督福音的中心。”很多宣教派人士也直言不諱地認為基督教義應當指導美國的外交政策而伊斯蘭教代表了罪惡。在民調中，71%的宣教派信徒認為基督徒和反基督徒的末日戰場就是世界的末日。研究宗教的學者和傳媒專家們也不斷地指出布什在 2002 到 2004 年間使用帶有聖經教義色彩的詞如“終極之日”，“罪惡之徒”對那些真實信徒們的重大含義。我們必須假定很多宣教主義派人士會以為布什理解的信仰和他們理解的信仰是一回事。但是由於對這一點缺乏確鑿有力的證據，有些自由派宗教人士認為布什是在玩弄精心策劃的自誇。在我看來美國新聞工作者應當對這種“不是”狂熱，“就是”自誇或者是挑動的現象進行徹底的發掘。2005

年的民調發現超過 55%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的政治領導人不應當依靠他們的宗教信仰來決定政策。

能夠解決有關布什真正信仰內含的人其實不難找到。Billy Graham 和德克薩斯州的傳教士 Arthur Blessitt 就是其中人選。這兩位傳教士都是神命主義者(相信一切都是上帝旨意安排的 — 譯者註), 都參與了將布什“帶向基督”的活動。另外一位是 Martin Hawkins, 他是布什的顧問也是專門從事闡述世界末日的牧師。根據他的一位助手說, Hawkins 教導布什“如何從神的角度來觀察世界”。

像 Pat Robertson 和 Jerry Falwell 那些著名的相信世界末日說的傳教士都與布什有過多次的會談或者是電話交談。2003 年 8 月, 電視傳教士 Jack Van Impe 聲稱白宮同他接觸, 尋求對創世紀的指導。他在自己的網站上聲稱, “我不能確定總統對那些預言有多少瞭解, 也不知道他對上帝的言論學習有多深。幾個星期之前, 白宮公共關係辦公室和國務卿賴斯都與我接洽, 要求我提供一個提綱。我花了好幾天時間準備這個提綱。我相信這個提綱現在在布什總統手裡。”白宮則否認曾經有這樣的接觸。現在也無法確認布什是否真的讀過 LaHaye 的《遺留在後》一書。只有 LaHaye 本人才清楚這件事情。LaHaye 也許還會記得布什在 1999 年對 LaHaye 在 1981 年建立的國家政策委員會發表過的演講。布什和 LaHaye 現在都不肯公佈這個演講的內容。此外, 布什對自己信仰問題上的含糊其辭還有一個理由是信徒中也有鉅大的分歧。神命主義者相信跟隨上帝昇天以及末日戰場的說法, 而統治派主義者 (dominationist) 則相信耶穌基督只有等到地球上已經由上帝統治了之後才會降臨。

簡單總結起來說就是, 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可能已經有好多年迷醉於我們所說的個人神權統治的信仰, 而在這個階段裡美國在中東的政策是圍繞著一個個人對聖經的極端的理解而制訂的。我們也許永遠不可知道真正的事實, 但是讀者們不妨對此謹記在心。

五、秋風又一年，新債多一分

正如美國的石油政策面臨挑戰以及白宮的神權統治思想使中東問題纏身，美國的債務困境和脆弱性也日益加深。關鍵的問題是要瞭解，發債業務和信用卡業務已經成為美國最富有的行業金融服務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聯邦儲備銀行可能也不敢再度壓縮金融的流動性。

例如，2006 年晚期最流行的金融產品是一種新開發出來的衍生產品成為“常量配比債權義務”（Constant Proportion Debt Obligation, CPDO）。很多專家認為這個產品非常危險且過度昂貴。儘管聯儲銀行在長期的一系列加息過程中企圖控制貨幣的流動性，華爾街上依然金錢橫流。有一份雜誌報導說，“對於那些搞兼併的人來說，借錢從來沒有這麼容易過。”“全球發行的高風險，高回報的債券，或者說垃圾債券已經達到歷史最高點。”標準普爾公司在 11 月初發表了題為〈美國信用品質 25 年來墜落到垃圾級別〉的報告。根據國際對沖和衍生產品協會《2006 年中期市場調查》，2006 年前六個月發佈的信用衍生產品所代表的美元的虛擬價值已經達到 26 萬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 52%。

有些經濟學家開玩笑說，即使是現在的大泡沫裡面也在生成新的小泡沫。不過德國經濟學家 Kurt Richebacher 對此有個解釋：“在過去兩年的（中央銀行）加息過程中，信用借貸的擴張速度是加快了而不是減緩了。2004 年，在聯儲銀行開始加息的時候，金融的或非金融的信用借貸增長了 28080 億美元……到 2005 年，信用借貸增長了 33359 億美元……2006 年的第一季度，信用借貸的增長速度達到每年 43928 億美元。”到了 2006 年中，《新聞週刊》報導說“美國自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美國人民借貸高於他們生產出來的價值 8%，達到 108.4%”。海外的借貸也與國內借貸同

步增加。美國的一般帳目項下的赤字達到歷史最高點。經濟學家 Laurence J Kotlikoff 在 7~8 月出版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評論》中發表了〈美國破產了嗎？〉一文。他在文中認為“國家是可能破產的。基於美國目前存在的 65.9 萬億美元的財務缺口，美國很明顯的在走向破產的邊緣。”

美國瘋狂舉債的長期收益者可能就是中國。中國是目前世界上領先的債權國之一。2006 年 10 月，中國的一位高層經濟學家指出，中國鉅大的外匯儲備到 2010 年就可能從目前的一萬億美元增長到二萬億美元。另外在市場上有傳言說，中國可能將其部分外匯儲備由美元轉為黃金，進一步削弱美元。總部在倫敦的匯豐銀行全球貨幣戰略首席顧問 David Bloom 在接受《每日電訊報》採訪時指出，“當房地產市場下滑的時候，我們擔心美國。美國每年支撐經濟最少要借貸一萬億美元。現在的風險已經從周邊發展到整個系統的心臟地帶……這個風險現在直接危及到整個資本主義的主動脈。”在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克林頓總統顧問 Kurt Campbell 認為目前在伊拉克的悲劇部分也是財經問題引起的。他認為由於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美國國債，可以說“伊拉克戰爭是用美國的國家信用卡刷卡而由中國來買單的。”

這樣，對本書第三部分可以這樣解讀，美國人的脆弱性，由於過去愚蠢的石油政策的失誤，激進的宗教在中東問題上的妄自尊大和過度的國內舉債，現在是咎由自取。

六、令人擔憂的歷史經驗

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似乎歷史上強國和帝國的興亡對美國沒有太多借鑒作用。因為美國這個國家是特殊的，是通過非常規的聯盟和集聚產生的聯邦國家。事實上，世界上其他強國的衰亡恰恰對

美國有著歷史借鑒作用。羅馬帝國，哈普士堡，西班牙曾經都是歐洲的強國，荷蘭人當年把紐約命名為新阿姆斯特丹，英國的維多利亞王朝和 1914 年前的大英帝國，都曾經是不可一世。他們都曾經是充滿活力，也都認為他們是與眾不同。這些內容在本書的不同章節中均有描述。在這裡，我提出這個觀點是希望讀者開始考慮歷史經驗的相似和需要注意之處。

我從 80 年代初期開始研究這些歷史的經驗。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興趣愈加強烈。當時對這些歷史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財經方面的研究——一個國家衰敗的工業，農業，海運業，或者其他就業基礎，貧富差別的擴大，不平等社會現象，經濟的全球化，債權和金融的晚期擴張等等。這些明顯和令人擔憂的現象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美國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接踵而來的是，我發現我的研究擴展到美國對全球政治和軍事的過度擴張，帝國形態下的傲慢，甚至是帝國主義的宗教以及跨國界的價值觀移植。需要關注和衡量的致命的弱點（原文為“Achilles' heels”，指希臘神話中大力士阿其利斯腳跟是最薄弱的地方——譯者註）逐日增加。尤其是到了 21 世紀初，一些美國的評論員開始發表這樣的言論：“是的，美國是一個帝國——但是我們同時又是一個強大的解放力量，一個代表民意的政府，一個信仰基督教的民族。”

到了 2006 年初，當我開始通過書店、寫文章，電臺廣播為推廣我的新書開始準備演講提綱的時候，我發現我總結的其他強國衰亡的歷史相似之處在喬治·布什領導下的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特點依次表述如下：

國家在經濟、道德或者愛國信念上的衰敗引起全民擔憂：上面提到的已經衰敗的四個國家都存在這個問題。從表現方式上來看，普通民衆或進步人士擔心的是就業衰減或者經濟上的不公平而保守派人士則擔憂愛國信念上的減退，家庭觀念，德行和價值觀的墮落。

宗教的日益強勢：這個通常表現為推動全球性的傳教活動（西班牙），或者宣敎主義的盛行（英國），強大的國敎對異見的排擠或鎮壓（羅馬帝國，西班牙），或者是企圖重建以往的重要的愛國宗教（荷蘭）。

科學與宗教信仰的衝突：宗教信仰可以用來鎮壓科學。例如羅馬帝國的末期（圖書館和天文館均被關閉），在天主敎的西班牙和在 19 世紀的英國都存在科學的達爾文主義同敎會的衝突。

帝國主義和軍事的擴張：羅馬帝國在其領地上訓練了大量的武裝力量，但最終無法保持這些領地；西班牙在全球進行擴張，但是由於在歐洲的捍衛天主敎的 30 年戰爭最終精疲力竭；荷蘭致力於在全球進行航運擴張並在 1688~1713 年間為此進行了耗資鉅大的戰爭；大英帝國由於其帝國的鉅大疆界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拖累（1914~1918 和 1939~1945）而最終衰敗。

過度舉債的負擔：雖然對羅馬帝國不適用，但是完全適用於揮霍無度和財經上無能的西班牙；18 世紀時的荷蘭任由其公民成為靠收租度日的地主階級而眼看著工業和日常的商業每況愈下；1914 年以前，大英帝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人，但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便由於債務和經濟的轉型而瀕臨破產。

製造業的衰敗和金融業的興起：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過程……英國曾經擔心不要重蹈荷蘭的覆轍，但最終還是走上了同樣的道路。

第七項令人擔憂的歷史案例，從實際角度上來看適用於相對現代的經濟形態，例如荷蘭和英國。它們都是以相當有特色的利用能源的方式達到了經濟上的成功。荷蘭通過聰明地使用水力和風力而成功成為世界強國，但是它的商業霸權由於新的能源出現而喪失。煤炭同樣也讓英國崛起直至由石油為基礎的工業和軍事的強勢轉移到美國手中。

很明顯，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這正好是美國目前面臨的狀況。激進的宗教活動，脆弱的石油政策，全球的擴張（尤其是在中東）和債務的堆積都非常顯而易見。應當說，美國的這些弱點是如此明顯，那四個已經衰敗的強國肯定會在一邊竊笑：人類怎麼會永遠不會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即使美國的宗教右翼可能會消退（但這也很難確認），美國在中東地區愚蠢的過度介入所造成的經濟上和地緣政治上的後果到了2010至2020年間很可能像西班牙所經歷的30年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對英國造成的影響那樣造成美國的衰敗。

基於過往的王朝（以及對過往政策的眷戀）從兩個政黨產生的經驗，美國的利益集團現在是四面楚歌。而且從某個角度講，美國的政治也面臨同樣困境。國家政策的真正轉折不可能是由於一個政黨的興衰而變革。過往霸權衰亡的經驗證明，當政治和改革陷入泥潭的時候，達爾文進化的結果往往是從另一個某處發現一個替代的強國。當一個國家或帝國走入地緣政治的夕陽中，隨之而來的是30年到40年的猛烈陣痛。這就是美國未來幾十年面臨的挑戰。

由於我最近出版的兩本書，有的批評家指責我是“布什攻擊家”，好在經過2006年喬治·W·布什因為走得太遠而聲名狼藉，所以對我的批評也慢慢淡化了。我在這裡寫下的無非是想告訴讀者我所見的布什王朝，其“神權統治”和政策，以及我對此強烈的反對意見。本書在2006年出版以後，有幸蒙亞瑟·施萊辛格寫信給我，他在信中說：“我還沒有看到任何人可以這樣揭露布什總統任期內的野心、錯誤和空想。你寫作的《美國神權統治》把這些和盤托出。”我當然希望能夠如此。但是我覺得我和其他人應當做得更多，而且更早。歷史將記載喬治·W·布什在他的兩個任期內是美國歷史上最具有破壞力的總統。